

【2019 佛教藏經會議專稿】

關於《續藏經》的底本問題 ——以《名僧傳抄》為例

釋定源（王招國）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哲學系副教授

《續藏經》（全稱《大日本續藏經》）是由日本學者前田慧雲（1857-1930）與中野達慧（1871-1934）兩人主導編纂而出版的一部鉛字印刷本藏經，明治三十八年（1905）四月開始編纂，大正元年（1912）十一月完成，全藏共收典籍 1756 部，7144 卷。這部藏經與其前後同樣以鉛印方式出版的《縮刷藏》（《弘教藏》）、《大日本校訂大藏經》（《卍大藏經》）以及《大正藏》（《大正新脩大藏經》）等有所不同，其所收文獻主要是此前藏經未收的典籍，尤以宋元以後的中國佛教撰述居多。因此，它出版之後，隨即受到國際學界的廣泛關注，直至今日，依然成為許多佛教研究者必需參考的重要資料。

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利用《續藏經》資料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非常豐碩，但是很少有人關注這部藏經當年使用的底本及其編纂過程。管見所及，至今日本國內還沒有人專門寫過討論《續藏經》底本的文章。中國方面，除一些簡要性論述外，楊之峰先生所撰〈《卍續藏經》的編纂及其文獻價值〉一文，算是比較集中地涉及這一問題，對了解《續藏經》的編纂多有幫助。¹展讀前田慧雲、中野達慧等人為刊

¹ 楊之峰，〈《卍續藏經》的編纂及其文獻價值〉，《圖書館理論與實踐》3，2009 年，頁 53-55。

印《續藏經》所寫的〈緣起〉及〈序文〉，不難了解到，當年編纂者為編輯這部藏經所付出的種種艱辛，尤其是為了廣泛收集各種文獻的底本，所耗之精力巨大。它的底本來源，除了當時借助南條文雄（1849-1927）的關係從中國獲得少量佚典之外，主要還是轉抄自日本國內各地博物館、圖書館、公私文庫以及古剎名藍等地所藏的各種寫本或刻本。這些當年抄寫的用於《續藏經》的工作底本，一直保存於京都大學「藏經書院文庫」，即所謂「藏經書院本」。因此，《續藏經》所收各種文獻的底本來源，大體經歷了從原底本（寫本或刻本）到「藏經書院本」，之後再錄入成「續藏經本」的三個階段。但遺憾的是，《續藏經》與其後編纂出版的《大正藏》不同，它並沒有明確交待所收每種文獻的底本出處，加上「藏經書院本」迄今尚未全部上網公開，所以《續藏經》的底本來源及其編纂過程，長期以來始終不太為人所了解。尤其從 2007 年以後，《續藏經》內容全部被 CBETA 電子佛典所收，較之以往使用更加方便，內容流傳甚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明《續藏經》的底本來源，而其底本內容又存在問題的話，那麼依此得出的研究成果自然就難以保障，甚至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因此，為了確保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實有必要關注《續藏經》的底本來源及其文本質量問題。

《續藏經》所收經典數量眾多，想要全面追討並釐清其底本來源，以一己之力顯然是不可能的。本文僅以《續藏經》所收《名僧傳抄》（以下簡稱「續藏經本」）為例，進行個案考察，管中窺豹，以見一斑。²之所以選擇這一文獻作為考察對象，是因為近年我在研究日本古寫經《高僧傳》時，經常參考和利用「續藏經本」，並獲知其原底本是東大寺僧

■

² 《名僧傳抄》最早收入藏經書院編印的線裝方冊本《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乙第七套第一冊（民國十二年上海涵芬樓，以及後來臺灣新文豐均有影印）。如果以後來東京株式社會國書刊行會出版 90 冊本《已新纂續藏經》，則收在第 77 冊，經號是 1523。CBETA 電子佛典即據後者內容收入。

人宗性（1202-？）手抄的《名僧傳要文抄》和《名僧傳指示抄》（現藏東大寺圖書館，以下統稱為「宗性抄本」）。讓人感到意外的是，當我將「續藏經本」與其原底本——「宗性抄本」進行比較後，發現兩者內容並不一致，相互之間除了個別文字誤植外，還存在嚴重的脫訛現象，同時了解到「續藏經本」中有十五位僧人傳記並不見於「宗性抄本」。這使我對「續藏經本」的底本來源及其文本質量問題產生極大疑惑。長期以來，我們只知道「續藏經本」依據的原底本是「宗性抄本」。既然如此，「續藏經本」與「宗性抄本」之間內容理應一致，即使有所差別，也應該差異不大，可事實並非如此。所以，我曾撰〈續藏經本《名僧傳抄》錄文疏舉正〉一文，指出並訂正了其中若干錯誤。³應該坦白的是，撰寫上文時我並不了解「續藏經本」比「宗性抄本」多出十五位僧人傳記的原因。然而，拙文發表後不久，我在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圖書館館員齊藤達也先生的幫助下，獲得京都大學藏經書院現存的《續藏經》當年編纂時所依據的《名僧傳抄》底本（以下將此簡稱為「藏經書院本」）。⁴由此知道「續藏經本」比「宗性抄本」僧傳人數差異的原因，進而了解從「宗性抄本」至「藏經書院本」，再到「續藏經本」的前後承襲關係和文本演變過程。

本文希望藉此《名僧傳抄》的個案分析，喚起大家注意《續藏經》的文本質量問題，以便今後推進《續藏經》的底本研究。

■

³ 定源，〈續藏經本《名僧傳抄》錄文疏舉正〉，《古典文獻研究》18，2015 年，頁 241-332。

⁴ 在收集京都大學藏經書院本《名僧傳抄》過程中，承蒙得到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圖書館以及當時任圖書館館員的齊藤達也先生（現任該館副館長）的幫助，謹此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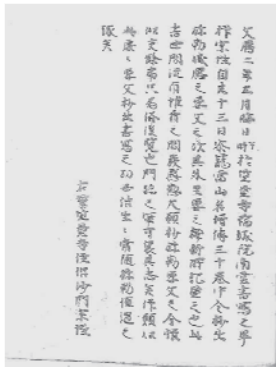
二、從「宗性抄本」到「藏經書院本」

《名僧傳》，梁代沙門寶唱（約 495-528）撰，三十卷（含序目共三十一卷）。此書編撰於梁僧祐（445-518）《出三藏記集》之後，並對繼其之後成書的梁慧皎（497-554）《高僧傳》產生過直接影響，是中國佛教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僧傳類著作。然而，此書自唐代以後在中國本土亡佚，所幸在亡佚之前傳入日本，並被鎌倉時期的東大寺僧人宗性所摘抄。根據宗性自己的記錄，他於文曆二年（1235）五月在笠置寺福城院南堂，依據東大寺東南院經藏所存的三十卷《名僧傳》進行了摘抄，其摘抄理由是「為拾彌勒結緣之先蹤，為記兜率往生之舊跡，借請彼本，所致此勤也」。⁵「宗性抄本」中所抄錄的僧人的確多是彌勒信仰者，看來宗性摘抄《名僧傳》主要與他個人的彌勒信仰有關。然而，宗性當年據以摘抄的《名僧傳》原本現已不知所蹤，因此，「宗性抄本」成為研究《名僧傳》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



圖一

《名僧傳要文抄》書封



圖二

《名僧傳要文抄》題跋



圖三

《名僧傳指示抄》書封

■

⁵ 《名僧傳抄》，CBETA, X77, no. 1523, p. 362c17-18。

「宗性抄本」有兩冊，第一冊是《名僧傳要文抄》（館藏編號第 13 函第 18 號），左邊袋綴，封面題「名僧傳要文抄沙門釋宗性」，內頁有「墨付廿九枚」，這是標明張數。正文從「名僧傳第三云，求那跋陀（梁言功德賢也）」開始，至宗性題跋「文曆二年五月晦日（午時）……右筆笠置寺住侶沙門宗性」止。第二冊是《名僧傳指示抄》（館藏編號第 13 函第 19 號），左邊袋綴，封面題「名僧傳指示抄沙門釋宗性」，內頁有「墨付貳拾四枚」，同樣是標明張數。此冊內容又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名僧傳說處」，內容從「名僧傳說處／第一／僧祐撰三藏記薩婆多部事」開始，至宗性題跋「自文曆二年五月十五日（午時）……有筆笠置寺住侶沙門宗性」止。二是「名僧傳目錄」，內容從「名僧傳第一（外國法師一）」開始，至「齊北多寶寺惠忍十七」止。以上兩冊全文均以行書抄寫，文面有雙行小字，有重文號，保存狀態良好。



圖四 藏經書院本書封

「藏經書院本」僅一冊，左邊袋綴，館藏編號為「藏，19，メ-1」。「藏」即指藏經書院。封面另寫有「528」，不知具體所指，或是藏經書院收藏的冊數編號。封面僅題「名僧傳抄」，正文內容順序是「名僧傳抄目次」、「名僧傳目錄」、「名僧傳抄」本文（相當於「宗性抄本」的「要文抄」部分）以及最後的「名僧傳說處」。其中「名僧傳目錄」的首頁上方鈐有「京都帝國大學圖書印」陽文硃印，旁邊另有一方橢圓的印章，上有文字「136225／大正 3.2.5」。

據京都大學「藏經書院文庫」網頁介紹，藏經書院收藏有《續藏經》當年使用過的工作底本，共 4270 冊，全部是

大正三年（1914）由藏經書院專務取締役松村甚左衛門氏贈送的。⁶

「藏經書院本」是由「宗性抄本」轉抄而來，這一點沒有疑問。可是，通過比較「宗性抄本」與「藏經書院本」，兩者之間無論是文獻名、撰者，還是內容結構、所收人數以及文字內容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以下就此分別論述。

（一）文獻名與撰者

首先是文獻名，如上所述，「宗性抄本」兩冊的文獻名稱實際各不相同，一是「名僧傳要文抄」，二是「名僧傳指示抄」。「藏經書院本」將此二者省略統稱為「名僧傳抄」，這一改動看似無關宏旨，實際僅用「抄」字，並不能突顯「要文抄」與「指示抄」本身所要表達的含義。「要文抄」意指所抄僧傳文字只不過是宗性認為的重要部分，並非《名僧傳》原文的全部抄錄。至於「名僧傳指示抄」的「指示」一詞，它在古代日語中有自我「提示」或「提醒」之意。「指示抄」與「要文抄」不同，其所抄僅是一些「……事」（這是日本古代佛教文獻慣用的一種抄錄形態）的綱目和「名僧傳目錄」，顯然有備忘和索引的目的。所以，為了更好了解「宗性抄本」的性質，以及宗性當年到底關注的是《名僧傳》的哪些內容，對「要文抄」與「指示抄」兩種名稱都值得保留，至少應該標注說明，以示將來。

其次，關於撰者，「宗性抄本」僅在「名僧傳目錄」開頭處有「莊嚴寺釋寶唱撰」字樣，「藏經書院本」依此照抄。但「藏經書院本」另於「名僧傳抄」本文開頭處別筆寫有「梁寶亮撰」四字，此撰名不見於「宗性抄本」。可以肯定這是「藏經書院本」抄寫者或校訂者擅自所加。

⁶ 京都大學「藏經書院文庫」網頁介紹參見：

<https://www.kulib.kyoto-u.ac.jp/bulletin/1387868?scene=2&clicktime=1607741965&enterid=1607741965&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2020/12/10。

根據《高僧傳》卷八〈寶亮傳〉記載，寶亮（444-509）是靈味寺僧人，生活年代大體與寶唱同時，一生著作頗豐，而他編纂的《大涅槃經義疏》尤其著名。⁷不過，並沒有任何史料表明，寶亮曾經撰有《名僧傳》，而且《名僧傳》的作者是寶唱，也從來沒有受到質疑。因此，「梁寶亮撰」顯然是「梁寶唱撰」之誤。

（二）內容結構

如上所述，「宗性抄本」與「藏經書院本」的內容先後順序不盡相同，為便於了解兩者的內容結構，茲以表格方式對照如下：

表一 宗性抄本與藏經書院本內容結構對照表

宗性抄本	藏經書院本
《名僧傳要文抄》、正文	《名僧傳抄》、名僧傳抄目次
《名僧傳要文抄》、題跋	《名僧傳抄》、名僧傳目錄
《名僧傳指示抄》、名僧傳說處	《名僧傳抄》、正文
《名僧傳指示抄》、題跋	《名僧傳抄》、題跋
《名僧傳指示抄》、名僧傳目錄	《名僧傳抄》、名僧傳說處
	《名僧傳抄》、題跋

如表所示，兩者結構的不同主要有兩點：第一，「藏經書院本」卷首根據所抄實際內容新編了「名僧傳抄目次」。這個新編「目次」，「藏經書院本」腳注明確有交待「目錄新作」。第二，「藏經書院本」將附在「宗性抄本」末尾的「名僧傳目錄」移到正文前面。以上兩點的不同，從文本編輯的角度來看，應該是合理的，尤其對新編「目次」，「藏經書院本」已如實交待，體現了編纂者的嚴謹性。然而，對「名僧傳目錄」原有的所在位置進行調整，「藏經書院本」並未作出任何說明，目錄順序雖與文字內容無涉，但既然編輯規則如此嚴謹，當有必要予以交待。

■

⁷ 《高僧傳》卷8，CBETA, T50, no. 2059, pp. 381b24-382a24。

（三）所收人數

《名僧傳》一書現已亡佚無存，其中所收具體多少僧人傳記，嚴格來說已不可得知。所幸宗性留下一份「名僧傳目錄」，依此可知，《名僧傳》整體分作十八科，總收僧傳人數至少有四百二十五位。不過，這一目錄能否完全反映《名僧傳》的原本面貌，頗為可疑。因為「藏經書院本」收有從《名僧傳》卷二十八摘抄而來的「法祥」傳記，但我們看「名僧傳目錄」，《名僧傳》第二十八卷僅列有二十一位僧名，而未見「法祥」之名。此即說明，宗性所抄的這份「名僧傳目錄」，尚不足以反映《名僧傳》的原貌。此外，根據「名僧傳目錄」，《名僧傳》卷四僅有「竺佛圖澄」，卷九僅有「廬山慧遠傳」，即此兩卷分別只收一人。參照《高僧傳》卷六所收之「慧遠」傳，以及卷九所收之「佛圖澄」傳，這兩人的傳記篇幅雖然不小，但並未達到一人傳記足成一卷的篇幅。如此看來，目前我們所見到的「名僧傳目錄」，實無法反映《名僧傳》所收僧傳的原有數量。

以上所談僅是《名僧傳》原本所收人數的問題，這裡主要想考察「宗性抄本」與「藏經書院本」各自所抄的實際僧傳人數。根據「藏經書院本」新編的「名僧傳目次」及其正文，該本實際所抄僧傳人數有三十六人，而「宗性抄本」所抄僧傳人數僅二十一人，兩者相差十五人。為更好地說明問題，茲將兩者所收人名、人數之異同列表對照如下：

表二 宗性抄本與藏經書院本所收人名、人數對照表

序號	藏經書院本	宗性抄本	備考
1	求那跋陀	求那跋陀	
2	道安		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
3	曇翼	曇翼	
4	竺法義	竺法義	
5	僧行	僧行	
6	法遇	法遇	

7	道恆	道恆	
8	覺世	覺世	
9	曇斌		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
10	曇濟	曇濟	
11	佛馱跋陀		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
12	曇摩密多	曇摩密多	
13	僧伽羅多哆	僧伽羅多哆	
14	道韶	道韶	
15	僧印		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
16	惠攬		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
17	納衣	納衣	
18	惠通	惠通	
19	道汪		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
20	惠永	惠永	
21	惠精		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
22	法純	法純	
23	惠慶	惠慶	
24	惠果	惠果	
25	道海	道海	
26	道法		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
27	僧業		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
28	法惠	法惠	
29	僧表	僧表	
30	智嚴		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
31	寶雲		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
32	法盛		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
33	僧洪	僧洪	
34	道嬌		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
35	曇副		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
36	法祥		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

「藏經書院本」比「宗性抄本」多出了道安等十五人僧傳。兩者差異的原因，如備考所示，「藏經書院本」多出的僧傳全部是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查閱「藏經書院本」，道安傳記之前赫然寫有「彌勒如來感應抄」七字，此已表明道安傳記史料的出處。但道安之後另多出的十四人僧傳，除了惠精、道法、僧業、智嚴、寶雲、法盛、道矯、曇副、法祥等九人傳記末尾抄有「感應鈔」三字，意在表明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之外，其他五位僧傳的史料出處均無任何交待。我們知道，《彌勒如來感應抄》也是宗性抄纂的作品，共有五卷，但摘抄的《名僧傳》內容僅出現在卷四中。⁸其實，在《彌勒如來感應抄》卷四中，從《名僧傳》抄錄而來的僧傳實際有十六人，而「藏經書院本」從中僅抄錄十五人。「藏經書院本」之所以漏抄一人，其中原因，以下再敘。

「藏經書院本」比「宗性抄本」多出的十五人僧傳，表明了「藏經書院本」的底本，並非僅據「宗性抄本」，同時還利用了宗性抄寫的《彌勒如來感應抄》。這種作法固然值得贊許，可以看出《續藏經》編纂者廣羅資料之用心，但有關底本從不同資料來源的關鍵性信息，「藏經書院本」未予全部標明，而「續藏經本」又不作任何交待，這顯然是不甚妥當的。

（四）內容漏訛

關於「藏經書院本」的底本來源，既然知道分別來自「宗性抄本」與《彌勒如來感應抄》，那麼按常理推斷，「藏經書院本」的內容與其分

■

⁸ 宗性一生著述多達兩百多種，其中有不少是根據他個人信仰而抄纂的作品，除了《名僧傳抄》與《彌勒如來感應抄》之外，還有《觀音菩薩感應要文抄》、《文殊師利菩薩感應要文抄》、《普賢菩薩感應抄》、《地藏菩薩感應抄》、《華嚴經感應要文抄》等。關於《彌勒如來感應抄》的研究，可參見平岡定海，《東大寺宗性上人研究並史料》，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60年，上、下冊。

別所據的底本內容應該是一致的，即使有所不同，也僅限於在轉錄過程中可能導致的個別文字差異。然而，通過比較發現，「藏經書院本」不僅存在個別文字的誤植，甚至還有文字脫漏以及文字錯亂等情況。比如，「藏經書院本」正文開篇第一位求那跋陀傳記，實由「宗性抄本」轉抄而成，但與「宗性抄本」相比，它明顯脫漏了二十四個字。茲將兩者相應部分文字對照如下：

藏經書院本「求那跋陀」傳記	宗性抄本「求那跋陀」傳記
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邪」？跋陀具以事對，答曰：「不痛」。豁然便覺。	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邪」？跋陀具以事對，答曰：「 <u>無所多憂</u> 」。 <u>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u> <u>答曰：「不痛」</u> 。豁然便覺。

「宗性抄本」的上段問答語意完整，與此相同的內容亦見於《出三藏記集》卷十四和《高僧傳》卷三所收的求那跋陀傳記。⁹相比之下，「藏經書院本」因脫漏上表中以粗體底線標示的二十四個字，結果導致了上下文意答非所問。「藏經書院本」何以脫漏這一部分，當與文中有兩處「答曰」有關。仔細查看「宗性抄本」圖版，兩處「答曰」是抄在隔行幾乎平行的位置，這應該是導致抄寫者看漏一行的原因。

此外，「藏經書院本」還有比上述更為嚴重的文字混亂情況，這主要集中在道安傳記中。前面提到，「藏經書院本」所抄的道安傳記並不見於「宗性抄本」，而是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然而，較之與《彌勒如來感應抄》，「藏經書院本」中的道安傳記末尾不僅脫漏了一大段內

■

⁹ 《出三藏記集》卷 14，CBETA, T55, no. 2145, p. 105c22-26；《高僧傳》卷 3，CBETA, T50, no. 2059, p. 344b12-16。

容，而且還混入了非道安傳記內容。先看「藏經書院本」的道安傳記末的以下一段文字：

安嘗與嘉及弟子法遇等，於彌勒佛前共立誓願，願生兜率。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故在城。門階戶席，皆璩舊物，巖見愴然而悲。縱恨其獨與璩狎，并候其風望，恐為人所輔，惡而害之。泰元十六年造彌勒像，今在玄集寺中，桓玄為之頌。

對應上文，《彌勒如來感應抄》卷四中的原文如下：

安嘗與嘉及弟子法遇等，於彌勒佛前共立誓願，願生兜率。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故在城中，萇與燕（符）登相持甚久，燕（萇）患之，問嘉曰：吾得天下不？答曰：略得。燕（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嘉所謂負責者也。燕（萇）死，其子略方滅符氏。跨有中洲，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年，隴西人，形貌鄙陋若不足，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往問善惡，隨事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讖記，不可領解，事過皆驗。及嘉臨死，有嘉色，人問之，答：始得。從安公於淨土，其日有人於隴上見之。

後有沙門惠戒，戒行清苦，住長安太后寺，疾棘口喚彌勒，言言相次，弟子智生問曰：何不願生安養，而呼彌勒？答曰：吾與安公等八人同誓乞面稟彌勒。道安、法遇早已如願。語畢，即有神光照之。

同第十一云：惠嚴者，不知何許人也。風姿瓌邁，才鋒領瞻，言聲琅琅，差出金石。與桓玄狎，玄與殷仲堪並稱，其口力辨兼內外。入蜀住龍淵寺，寺漢益州牧劉焉（焉）所立，時刺史毛璩深相賓禮，惠持晚至，惠嚴兄事之，動靜出入，不能暫念。每推

其才義，昌言不及，惠持亦不能折其辨宣也。譙縱殺璩，洲集僧設會，嚴不得已而赴。素有形表，爾曰彌秀，縱本不及勝流，睹而目失。門階戶席，皆璩舊物，嚴見愴然而悲，縱恨其獨與璩狎，並悞其風望，恐為人所輔，惡而害之。泰元十六年造彌勒像，今在玄集寺中，桓玄為之頌。

通過前揭兩段文字的比較不難看出，「藏經書院本」由於漏抄前揭粗體底線標示之文字，將原本屬於惠嚴傳記的「門階戶席……桓玄為之頌」部分文字接抄在了道安傳記的末尾，從而導致類似如上的脫訛現象。「藏經書院本」為何漏脫這一大段文字？日本學者春日禮智氏曾撰有〈淨土教史料として名僧傳指示抄名僧傳要文抄竝に彌勒如來感應抄第四所引の名僧傳に就いて〉一文，已提到這一問題。¹⁰根據他的說法，《彌勒如來感應抄》卷四有兩種寫本，一種寫本內容保存完整，另一寫本脫落了道安傳記的末尾以及惠嚴傳記的開頭。《續藏經》編纂者當年使用的《彌勒如來感應抄》恰好是文字脫落的一種寫本，且未能細察其內容，故而沿襲了這一錯誤。

由於「藏經書院本」所據的底本存在問題，導致了《續藏經》編纂者將惠嚴傳記文字誤作道安傳記內容。如此一來，不僅造成了道安傳記的混亂，也造成惠嚴傳記失收的結果。需要注意的是，前揭道安傳記末尾還提到惠戒傳記，考其內容，他實際就是《名僧傳》卷二十三所收的惠精。所謂「惠戒」是由「惠精」與「曇戒」兩名的合稱，如《名僧傳抄》載「惠精，又名曇戒。……後與安同憩長安太后寺」。由於惠精在《名僧傳》卷二十三已有傳記，所以附在道安傳末的曇戒，也就是惠精，應該是一種附傳性質。因此，這裡我們不作為正傳的人數計算。也就是

■

¹⁰ 春日禮智，〈淨土教史料としての名僧傳指示抄名僧傳要文抄竝に彌勒如來感應抄第四所引の名僧傳に就いて〉，《宗學研究》12，1936年，頁53-118。

說，《彌勒如來感應抄》雖然有《名僧傳》中的十六位僧傳文字，但轉抄到「藏經書院本」時就只剩下十五位了。歷史雖然不能假設，如果當年《續藏經》編纂者使用的底本是另一種《彌勒如來感應抄》，那麼，我們現在看到的《名僧傳抄》或許就有惠嚴傳記。惠嚴傳文，未見於慧皎《高僧傳》，亦不見於其它資料。《名僧傳》為他立傳，且有幸部分傳文被宗性所抄，雖然文字不多，但為我們了解惠嚴的生平事蹟是彌足珍貴的。

（五）文字正誤舉隅

「藏經書院本」不僅存在類似以上的脫漏，另外在轉抄過程中也出現一些原底本不誤，轉抄時反誤的現象。以下僅利用「宗性抄本」與「藏經書院本」，試舉求那跋陀與曇翼兩人傳記的個別文字差異，以見一斑。

1. 「宗性抄本」：其年冬至京師，勅住祇洹寺，延入宮臺傳譯（求那跋陀）。

按：「藏經書院本」將上文中的「延」字誤錄作「遙」。

2. 「宗性抄本」：彭城譙王義宣並師事焉（求那跋陀）。

按：「藏經書院本」將上文中的「並」字錄作「置」。之後在天頭處標注「置作並」，實際原文即作「並」。

3. 「宗性抄本」：辯章文義，妙會先旨（求那跋陀）。

按：「藏經書院本」將上文之「旨」字誤錄作「自」。

4. 「宗性抄本」：譙王問其故，跋陀陳事懇切（求那跋陀）。

按：「藏經書院本」將上文之「事」字誤錄作「爭」。

5.「宗性抄本」：怳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賞童子，顧覓不見（求那跋陀）。

按：「藏經書院本」將上文之「欲賞童子，顧覓不見」四字誤錄作「欲賓童子，顧覽不見」。

6.「宗性抄本」：勅問並誰為賊（求那跋陀）。

按：「藏經書院本」將上文之「並」字錄作「置」。之後在天頭處標注「置作並」，實際原文即作「並」。

7.「宗性抄本」：無片言及軍事者，孝武明其純謹，益加禮遇（求那跋陀）。

按：「藏經書院本」先將上文之「片」字誤錄作「行」，再於字旁校訂作「片」，並於天頭標注「行，《高僧傳》作片」。此外，又將上文之「純」字誤錄作「託」，後於原字上修改作「純」，並於天頭標注「託作純」。實際此「片」「純」二字原底本並無誤，只是抄者未能辨識而已。

8.「宗性抄本」：公卿會葬，榮哀備焉（求那跋陀）。

按：「藏經書院本」將上文之「哀」字誤錄作「眾」。

9.「宗性抄本」：年十六，師事道安，善解大乘（曇翼）。

按：「藏經書院本」先將上文之「善解」誤錄作「善辭」。

10.「宗性抄本」：翼負錫南征，至即締構。一年功畢，名長沙寺。後遊益部（曇翼）。

按：「藏經書院本」將上文之「負」字錄作「貞」。此外，將上文最後的「益」誤錄作「蓋」。

11. 「宗性抄本」：山既神異，行者憚之。土人說：桓玄聞山有白雉兔（曇翼）。

按：「藏經書院本」將上文之「土」字誤錄作「上」。

12. 「宗性抄本」：明若晨義，闔洲驚駭（曇翼）。

按：「藏經書院本」將上文之「駭」字誤錄作「騷」。

13. 「宗性抄本」：年八十二，義熙中卒云云（曇翼）。

按：「藏經書院本」將上文之「熙」字誤錄作「照」。

以上僅是兩人傳記的比較結果，其中「藏經書院本」的誤錄文字達十六字之多。我也核對了其他傳記，誤植率雖然沒有這麼高，但由此推知「藏經書院本」的錄文質量。

以上我們大致考察了從「宗性抄本」到「藏經書院本」的演化情況，並指出「藏經書院本」底本的兩種來源以及使用底本不善而導致的錯誤，乃至在轉抄過程中存在的人為脫訛等問題。僅從本節討論的內容來看，「藏經書院本」的文本質量令人堪憂，因為它在抄錄過程中，除了沿襲原底本的錯誤之外，又衍生出不少新的錯誤。

三、「藏經書院本」的二次加工及其與「續藏經本」的異同

如前所述，「藏經書院本」的文本質量雖然不佳，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藏經書院本」為了保障和提高文本質量，實際也作了不少「二次加工」的工作。「二次加工」的概念是業師方廣錫先生針對敦煌寫本而提出的一種限定性描述。方先生把抄寫文獻的第一過程稱為文本形成的「第一工序」。但是，有時第一工序產生的文本會有若干不足，這就需要在卷面上做一定的加工，於是形成本文所謂的「二次加工」。

方先生指出，二次加工的具體方法有塗改、刮改、行間校加字、行間加行、校改標注、刪除、倒乙，甚至包括句讀、科分、點標、批注等。這種加工，有時與第一工序同時進行，有時則由校對者校對時，或者閱讀者閱讀時發現，從而進行糾正。¹¹方先生這裡所說的情況，雖然是針對敦煌遺書而言，但這一限定性描述也基本適用於本文討論的「藏經書院本」。

「藏經書院本」依據的底本，無論是「宗性抄本」，還是《彌勒如來感應抄》，都是一種古代寫本，既是文獻，也是文物。一般情況下，作為一種手抄本，誤、脫、衍等現象在所難免。「宗性抄本」與《彌勒如來感應抄》的寫本既然屬於古代文物，自然不便擅自改變原寫本的面貌。面對這種情況，如果據其轉抄作成另一種寫本，並在其文面上進行所謂的二次加工，無疑是一種較好的過渡方式。實際上，「藏經書院本」就是編纂「續藏經本」之前屬於一種過渡性質的工作底本，它文面上有各種各樣的二次加工，標注了不少校讀者的校勘符號和修訂意見。這一作法的目的，無非是保證「續藏經本」錄文的文本質量。

關於《續藏經》當年具體如何製作工作底本？中野達慧在《日本續藏經編纂印行緣起》中談過以下一段話：

收錄之書，以類排列，從時敘次。其間抄本居多，往往有年代杳遠，幾經散佚，卷軸參差，魚目混珠，一見難分者。又有同書異名，異書同名者。至刊行之書，亦不特馬焉誤多，其文章互有異同，因取數本，讎校同異，繁者芟之，訛者正之，缺者補之。概以歸至當，其互有得失者，並揭諸欄頭，決不以私見妄為去取焉。且隋唐之注疏，多貴脈絡一貫，故自卷首至末尾，絕不區劃分段，

■

¹¹ 參見方廣錫，〈略談敦煌遺書的二次加工及句讀〉，《方廣錫敦煌遺書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219-233。

讀者病諸。今攷查文意，改章分節，或釐經會疏，傍施句讀。或付訓點，庶乎讀書勞少而易曉矣！¹²

由此可知，當年《續藏經》編纂者為了保證文本質量，已做了許多方面的工作，具體內容涉及文獻分類、考異、校勘（包括刪繁補缺，訂正訛誤）、分章、分段以及句讀、訓點等等。可見，編纂者當年之苦心孤詣。

具體到「藏經書院本」，誠如中野達慧所言，在其文面上幾乎每一頁行間以及天頭處，都有不少校加字和標注，以及各種各樣的符號，乃至通篇進行了斷句標點（未見有訓讀符號）。這表明「藏經書院本」存在類似敦煌遺書的「二次加工」情況。以下我們從校改、疑字標注、句讀等幾個方面，對「藏經書院本」的二次加工情況進行考察，以窺見《續藏經》編纂工作之一斑。

（一）校改

關於校改，需要事先說明的是，據我考察，「藏經書院本」在抄寫過程中，如果發現其所據底本個別地方有誤，有時採用的方法是逕改。比如，求那跋陀傳記中有一句，「宗性抄本」原作「後因閑談，聊戲門曰」。「藏經書院本」卻將其中「門」字逕改為「問」字。這一改訂雖未作任何說明，但所改之字可從。類似這種逕改情況不少。茲因沒有作任何標注和說明，故不列入「二次加工」校改的討論範圍。

「藏經書院本」的校改的方式有多種，大致可分為塗改、行間或行外校加字等。結合這些校改方式，文中還有倒乙符、刪除符、重文符、省略符（即用□□符號代替）、科分符（分段符）等，甚至有些字句先

■

¹² 本序內容為前田慧雲編《大日本續藏經目錄》所收，因為用的鉛字本版，未有出版年月。

被塗改，後來認為原字可行，於是又用日語片假名「イキ」來表示應該保持原文，不煩改字。

具體而言，「藏經書院本」的校改情況有如下幾種：

第一種是「藏經書院本」承襲了原底本錯誤，後經校改者發現，在沒有出注或校改依據的情況下，進行了刪改、加字、回改等。首先，刪改方面，比如，「宗性抄本」在求那跋陀傳記中有「無嘉將末，譙王屢有恠夢」一文，「藏經書院本」先照錄原文，之後將文中的「無」字用「×」符號刪除，並於其旁寫一「元」字，表示「無」字是「元」字之誤。說明「宗性抄本」所據的祖本，此字原來或作「无嘉」，接著又被抄作「無嘉」。將「元嘉」抄作「无嘉」，是因「无」「元」二字字形相近，容易抄錯所致。「藏經書院本」類似這種刪改情況甚多，幾乎每一頁都有。其次，加字方面，同樣以求那跋陀傳記為例，此傳「宗性抄本」有一文作「即往北湖釣臺香祈請」，「藏經書院本」先照錄原文，後於天頭處標注「香上恐脫燒」，隨後將此五字刪除，直接在文中的「香」字左上方添寫一「燒」字。類似這種原文脫字，而進行校加的例子，相對較少。最後，關於回改的情況，它是指原底本不誤，被抄寫者誤抄，隨後發現又改回為原字。「藏經書院本」這種回改情況時有所見。例如求那跋陀傳記中，「宗性抄本」原文有「其年冬直京師，住祇洹寺」一文。「藏經書院本」誤抄作「其冬冬直京師，住祇洹寺」，之後發現第一個「冬」有誤，故將其刪除，回改成「年」字。

第二種是「藏經書院本」承襲原底本錯誤，後經校改者發現，再後依據某一文獻作了提示或校改。從「藏經書院本」天頭標注的信息來看，明確標示參考過梁慧皎《高僧傳》的地方共有七處，均集中在「名僧傳目錄」（一處）和求那跋陀傳記（六處）。例舉如下（前面是本文，之後括弧內是天頭標注）：

1. 「晉於替青山寺竺道影曠六」(道,《梁高僧傳》作「法」)
2. 「彭城譙王義宣置師事焉」(「彭城」下,《高僧傳》有「王義康丞相南」六字)。
3. 「勅見跋陀,時未及淨驗」(驗,《高僧傳》作「髮」)。
4. 「乃逼與俱下過江洲」(《高僧傳》「州」)。
5. 「悅忽之間,覺行十餘步」(《高僧傳》「悅」)。
6. 「既染覺戾,分為灰粉」(覺戾,《高僧傳》作「亶戾」)。
7. 「及軍敗,簡檢無行言及軍事者」(行,《高僧傳》作「片」)。

上舉七例,表面看來僅是提示異文,實不盡然。其中 5、7 兩例,已在本文中根據天頭提示作了校改,只是第 7 例的「行」字,「宗性抄本」原文作「片」。「片」與「行」在行書寫法上字體接近,容易誤判,「藏經書院本」顯然是誤抄。通過以上七例,說明編纂者當年在校訂「藏經書院本」時參考過慧皎《高僧傳》。應該指出,「藏經書院本」參考《高僧傳》僅限於「名僧傳目錄」和求那跋陀傳記部分。其實,「藏經書院本」所抄的三十六位僧傳,大部分可以與《高僧傳》相互參校,為何在求那跋陀傳記之後沒有參校《高僧傳》,詳細情況並不清楚。

第三種是「藏經書院本」並沒有誤抄,只是編纂者擔心原來抄寫的文字,或因異體字,或因文字太過潦草而不易辨識,於是在其原字旁標以更易判讀的文字。比如原文中的「竺」、「竿」、「帛」、「寐」、「侯」、「曰」、「灸」等字,基本都以旁注的方式改為了「竺」、「算」、「虎」、「寂」、「侯」、「因」、「亦」等。類似這些異體字,一般情況不太可能產生內容歧義。但如果錄文者不熟悉這些字體,則容易造成誤錄。因此,這種標注方法,可以減少錄文的錯誤率,無疑有它可取之處。

(二) 疑字標注

如前所示，中野達慧對製作《續藏經》的工作底本時談到「其互有得失者，並揭諸欄頭，決不以私見妄為去取焉」，意指面對原底本可疑文字，為表示謹慎起見，不擅自校訂，而是揭諸「欄頭」，以作提示。所謂「疑字標注」，蓋指此而言。通觀「藏經書院本」，從開頭「名僧傳目錄」一直到「名僧傳說處」乃至最後的「題跋」，幾乎每頁天頭處都可見到「疑字標注」。標注方式各色各樣，比如「西河疑河西」、「得應疑倒置」、「雷疑溜」、「佛下疑脫念字」，即用「…疑…」的方式提示可能存在的倒乙、誤、脫等現象。此外，還用「須泉恐酒泉」、「鞭力」、「形刑通」(即形通刑)。查核這些疑字標注，大部分被「續藏經本」所承襲，但又有所不同，下面再談。

(三) 句讀

句讀是為了更好地理解文獻內容而使用的一種標示方法，古已有之。與現在新式標點不同的是，古代使用句讀符號比較簡單，句與句之間基本只使用相當於現在的句號，或作一點。《續藏經》所收的文本大部分都施以句讀，《名僧傳抄》的「續藏經本」同樣也是如此。查「續藏經本」的原底本——「宗性抄本」與《彌勒如來感應抄》，並未見有句讀符號，但在「藏經書院本」中卻出現了句讀符號，這說明「續藏經本」的句讀，乃承襲自「藏經書院本」而來。

需要指出的是，「藏經書院本」的句讀符號僅見於正文和題跋，而且與「續藏經本」比較，它的句讀相對簡單。「續藏經本」在承襲「藏經書院本」句讀的基礎上，基本採取能斷開的就盡量斷開。不過，兩者都有句讀錯誤的情況，以下試舉數例，以便說明。

1. 道安傳記有一文，「藏經書院本」的句讀是「每講席一建振發風采網領。玄宗開張。惠目理思。懷道之士皆負書而至」。「續藏經本」作「每講席一建振發。風采網領。玄宗開張。惠目理思。懷道之士皆負書而至」。在此，「續藏經本」只多斷開一句。實際上，兩者的標點均有未諦，正確標點應作「每講席一建。振發風采。網領玄宗。開張惠目。理思懷道之士皆負書而至」。

2. 竺法義傳記有一文，「藏經書院本」的句讀是「年十三伏膺道門修治戒行標秀之稱與日。而升好大乘學」。「續藏經本」點作「年十三。伏膺道門。修治戒行。標秀之稱。與日而升。好大乘學」。

3. 僧行傳記有一文，「藏經書院本」的句讀是「與和上影響。惠基共弘。至教惺山陰人」。「續藏經本」點作「與和上影響惠基。共弘至教。惺山陰人」。

以上2、3兩例「藏經書院本」的句讀均有誤失，可依「續藏經本」改訂。相反，也有「藏經書院本」句讀可從，而「續藏經本」反誤的情況。比如，僧供（洪）傳記有一文，「藏經書院本」句讀作「誦經一月許。日夢見其所鑄像」，「續藏經本」卻作「誦經一月許日。夢見其所鑄像」。此當遵循「藏經書院本」的句讀為妥。

以上是「藏經書院本」二次加工的大體情況，其目的無非是為了校正原底本，以確保「續藏經本」的內容質量。既然「藏經書院本」是「續藏經本」的工作底本，那麼兩者內容應該沒有多大差別。通過比較結果顯示，兩者在文本題名、撰者、結構上的確完全相同，所不同者除句讀外，主要體現在以下個兩方面。

第一，文字不同。具體情況，請看下表：

表一 「藏經書院本」是「續藏經本」相異處對照表

序號	藏經書院本	續藏經本	內容所在
1	宋天竺寺釋弘稱八	宋天竺寺釋弘苾八	目錄
2	晉河北曇稱二	晉河北曇苾二	目錄
3	齊山陰天柱寺釋法慧	齊山陰天柱等釋法慧	目錄
4	形色庸猥，服章垢悴	形色蕭猥，服章垢悴	道安
5	身光照夜，明若晨義	身光照夜，明若晨曦	曇翼
6	請決所疑	誦決所疑	曇斌
7	不虞見恠，神有忽焉	不虞見恠，神有惡焉	道韶
8	性履清純，意懷篤至	性腹清純，意懷篤至	僧印
9	不接庸隸，必出矜愛之言	下接庸隸，必出矜愛之言	僧印
10	舉國禪思，以法忘食	舉國禪思，思法忘食	惠攬
11	入定見彌勒	人定見彌勒	惠攬
12	以廉約為風，姿神高秀	以廉約為風，姿禪高秀	道汪
13	費游父子雅相知愛	費游文子雅相知愛	道汪
14	世間之苦難可久堪	世間之苦難可大堪	惠精
15	各從其志，吾助爾意	各從其志，吾助爾意	惠精
16	安卒後，隆安中疾病，口誦彌勒	安平後，隆安中疾病，口誦彌勒	惠精
17	冒險而遊焉	冒岑而遊焉	道法
18	若不斷三毒，阿求勉脫	若不斷三毒，何求勉脫	法盛
19	有羅漢名呵利難陀，為濟人故	有羅漢名可利難陀，為濟人故	法盛
20	升兜率天，寫佛真形	舛兜率天，寫佛真形	法盛
21	印此像也，常放明	印此像也，常放光明	法盛
22	四眾伎樂四時娛樂	四眾伎樂四時咲樂	法盛
23	遠人皆率從像悔過	遠人皆卒從像悔過	法盛
24	盡思幽深，應門到戶	盡思幽深，應門到广	曇幅

根據上表文字的前後文意推斷，序號中的 1、2、3、4、6、7、8、11、12、13、14、15、16、17、19、20、22、23、24，均屬於「藏經書

院本」原文不誤，「續藏經本」反誤之例，誤錄比例相當之高。餘下的序號 5，「藏經書院本」原誤，「續藏經本」逕改。序號 9，「續藏經本」作「下接庸隸」，語意更長。序號 10，「以」、「思」二字似乎皆可通，但「續藏經本」逕改，不知何據。序號 21，「藏經書院本」顯然脫一「光」字，「續藏經本」逕補，可從。

第二，標注不同

如前所述，「藏經書院本」有許多二次加工的各種校改和疑字標注。由於「藏經書院本」是一種工作底本，其目的是為「續藏經本」服務的。因此，它文面上的各種校改符號，自然無需一一標出，也不必呈現在「續藏經本」中，只要採納其校改結果即可。此外，「續藏經本」在轉錄「藏經書院本」內容時，除了存在類似前揭的誤錄、逕改、逕補等情況外，還充分吸收了「藏經書院本」天頭的疑字標注內容。目前，這一部分內容即可見於「續藏經本」腳注，但也有一定的差別，「續藏經本」在腳注中新加的條數不少。根據我的統計，「續藏經本」的以下腳注均不見於「藏經書院本」，如：「比疑北；舟疑丹；治疑冶下同；等疑寺；宋疑榮或宗下同；掘下疑脫經字；咸字原本書體不明；典疑曲；誰疑譙；榮疑營；頤字疑衍；榮疑營；勞疑營；陽疑湯下同；知疑如；欲疑歛；辭疑解；貞疑負；蓋疑益；已疑巴下同；上疑土；香疑高；甚疑其；照疑熙；風疑夙；笛疑留；遠惠疑倒；癡疑癡；繫疑擊；量疑置；後疑復；壞疑懷；烏疑焉；誦疑請或諮；往疑法；體疑禮；移下疑脫軀字；佛疑為；遂字更勘；謂疑請；遙淥原本字体不明；凡字更勘；甫字更勘；舟疑丹；投疑捉；人疑入（1）；聞字更勘；人疑入（2）；量疑置；結疑緒；忿疑急；計疑討；門疑聞；任疑汪；天疑大；各疑谷；脫疑晚；苦疑若；別疑則；柔疑菜；楊候二字更勘；據疑據；高疑豪；違字疑剩；問疑悶；

和疑果；賓疑闡下同；都疑覩；算疑畢；印疑卽。」¹³

「續藏經本」新增的標注共有七十一條，如果根據這些標注進行校改，應該說大部分是可以遵循的。此外，「續藏經本」的標注雖然部分承襲「藏經書院本」而來，但相互之間也有不盡一致的地方，共有四處，茲列表如下：

序號	藏經書院本	續藏經本	備考
1	佛下疑脫念字	佛疑竺佛念	見「道安」傳
2	海行疑十餘	海行疑作十餘	見「納衣」傳
3	(幼)勿力	幼疑勿	見「惠通」傳
4	之下疑有脫字	之下疑脫狀字	見「道法」傳

上表中序號 2、3 的標注方式雖然稍有不同，但內容沒有實際差別。序號 1，「藏經書院本」僅提示原文應作「佛念」，「續藏經本」加上「竺」字，使得竺佛念有了完整姓名。序號 4，「道法」傳記原文是「見諸先緣及一切眾生受苦之」。「藏經書院本」懷疑「之」下有脫字，「續藏經本」則進一步提示所脫之字是「狀」字。

「藏經書院本」與「續藏經本」兩者標注的不同，說明「續藏經本」在「藏經書院本」的基礎上又做了大量校補工作，可以為我們今後整理《名僧傳抄》提供有益參考。

四、結語與餘論

通過以上考察，關於「續藏經本」的底本來源及其編纂過程，大致可以了解以下幾點：

■

¹³ 括號內容為筆者據「藏經書院本」與「續藏經本」自行統計。

(一)「續藏經本」的原底本是「宗性抄本」以及同樣是宗性所抄的《彌勒如來感應抄》。

(二)「續藏經本」現有三十六位僧傳，其中二十一位僧傳抄自「宗性抄本」，其餘十五位僧傳抄自《彌勒如來感應抄》卷四中摘錄的《名僧傳》內容。

(三)《續藏經》編纂者當年利用「宗性抄本」以及《彌勒如來感應抄》抄錄並編輯了一種「續藏經本」的工作底本。此底本現藏京都大學「藏經書院文庫」，即本文所謂「藏經書院本」。

(四)「藏經書院本」與其底本「宗性抄本」、《彌勒如來感應抄》相比，其結構與內容並非完全一致，最顯著的差異是，「藏經書院本」在據底本抄錄時，於「求那跋陀」傳記中漏抄一行左右。同時，由於它未能利用《彌勒如來感應抄》內容保存完整的寫本，而利用了另一種道安傳記存在大段漏脫文字的寫本，故而承襲其誤，導致惠嚴傳記失收，並將惠嚴傳記的部分文字混入道安傳記之中。

(五)「藏經書院本」內容方面，除有一行左右及大段漏脫外，個別文字存在原底本不誤，抄錄時反誤的情形，而且抄錯率極高。「藏經書院本」作為一種「續藏經本」的工作底本，在初次轉寫本的文本基礎上並進行校改、疑字標注乃至句讀等方面的二次加工，可以看出當年編纂者為了保證「續藏經本」的文本質量，所付出的種種努力。

(六)「續藏經本」內容，乃直接承襲「藏經書院本」而來。但在轉錄過程中，既改正或充補了「藏經書院本」的若干誤脫文字與不足，也衍生出不少新的錯誤。兩者的最大區別還有，「續藏經本」對「藏經書院本」中的可疑文字進行了標注，這反映出「續藏經本」在「藏經書院本」的基礎上，又做了大量標注工作。

(七)「藏經書院本」及「續藏經本」雖然做了各種為了保證文本質量的工作，但《名僧傳抄》的文本編輯，卻未必是「後出轉精」。因為，「藏經書院本」有不少誤抄原底本的文字，而「續藏經本」在「藏經書院本」的基礎上又因各種原因新添了不少錯誤。

實際上，關於「續藏經本」的文本質量問題，周叔迦（1899-1970）先生早年已經指出，他在未獲得「宗性抄本」與「藏經書院本」的情況下，僅利用《高僧傳》等資料，經過前後內容互校，共花費一年多時間，改正了其中兩百餘處錯誤，其功甚偉，不可忘記。遺憾的是，周先生的校訂本目前僅有金陵刻經處本，流傳不廣，利用者不多。展讀周先生的校訂本，讓人感到驚奇的是，他除了訂正原本的許多錯誤之外，還補上了求那跋陀傳記中漏抄的「無所多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一文。據周先生校訂本所附題跋所云：「日本續藏經中有日僧宗性名僧傳鈔一卷，所據當是古寫本」可知，他當年並未看到「宗性抄本」。此文內容應該是他依據《高僧傳》求那跋陀傳記而補入的。至於道安傳記中的大段脫漏和混入情況，周先生當年未予指出，自然未作補正。

我們知道，《續藏經》的編纂工作，前後跨度八年，除了當年主事者有前田慧雲和中野達慧之外，當時到底多少人參加工作？各項工作具體如何分工？哪些人負責哪些工作？凡此問題，並不清楚。僅從「藏經書院本」來看，前後抄寫的筆跡及風格有所不同，至少由兩人以上抄寫。有趣的是，「藏經書院本」校改及天頭標示部分的文字，與我在「藏經書院文庫」收藏釋善珠《本願藥師經鈔》卷首處看到的中野達慧的親筆字（朱筆）字體風格極為相似。故我猜測至少「藏經書院本」的校改及天頭標示部分文字，很有可能是中野氏親自所為。總之，「藏經書院本」可以為我們了解《名僧傳抄》的編輯過程，乃至研究《續藏經》的編纂提供許多新的信息，具有非常高的史料價值。

「續藏經本」的底本來源雖有兩種，但從《彌勒如來感應抄》中抄錄並進行編輯這一點來看，「續藏經本」實際是一種「輯佚」的結果，具有「輯佚」性質，如果承認這一點，那麼當年「續藏經本」編纂者除了利用「宗性抄本」及《彌勒如來感應抄》之外，也應該將散見於其它文獻中的《名僧傳》佚文加以收集，並編入其中。湯用彤先生曾經提到，《大日本佛教全書》第 111 冊收《三論祖師傳集》，可能是宗性所編的作品，其中所錄的部分僧人傳記，也許參考過《名僧傳》，尤其是其中的曇濟傳，與《名僧傳抄》所收的曇濟傳文字略同，並可補缺。¹⁴湯先生的這一提示，對收集《名僧傳》佚文而言，是值得關注的。此外，道宣（596-667）《續高僧傳》卷一〈釋寶唱傳〉即見有《名僧傳》〈序文〉的部分佚文。¹⁵這一佚文對我們研究《名僧傳》的成書尤為重要。同時我們也了解到，在隋代吉藏（549-623）《法華義疏》、《法華玄義》以及唐代元康（約 626-699）的《肇論疏》中也有《名僧傳》的若干佚文。¹⁶

■

¹⁴ 湯用彤，〈中國佛教宗派問題補論〉，《魏晉玄學論稿及其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36-337。

¹⁵ 《續高僧傳》卷一〈寶唱傳〉載「其序略云：夫深求寂滅者，在於視聽之表；考乎心行者，諒須丹青之工。是萬象森羅，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威加赤縣，功濟蒼生。皇上化範九疇，神遊八正。頂戴法橋，伏膺甘露。竊以外典鴻文，布在方冊。九品六藝，尺寸罔遺。而沙門淨行，獨亡紀述。玄宗敏德，名絕終古。擁歎長懷，靡茲永歲。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邁。著述集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敏，預班二落。禮誦餘日，招拾遺漏。文多不載。同傳後又載「故其傳後自序云：豈敢謂僧之董狐，庶無曲筆耳」。可見，《名僧傳》末尾附有寶唱的序文，以上底線標示部分，即為其佚文。見《續高僧傳》卷 1，CBETA, T50, no. 2060, p. 427b29-c10。

¹⁶ 如隋代吉藏《法華義疏》引有「名僧傳云：『基公聽竺道生講善於《法華》，雖有二判，無以取決』」，見《法華義疏》卷 2，CBETA, T34, no. 1721, p. 467b20-21，以及《法華玄論》中引「名僧傳云：『講經之始，起竺法護。護公既親譯斯經，理應敷闡。自護公之後，釋安竺汰之流，唯講舊本而已。及羅什至長安，翻新法華竟，道融講之開為九轍，時人呼為九轍法師』」，見《法華玄論》卷 1，CBETA,

道宣、吉藏以及元康的這些著作，對《續藏經》編纂者當年來說，似非罕見之書，他們完全有機會了解並收集到這些佚文。此外，唐代陸羽寫過一篇〈遊慧山寺記〉，其中載「寶唱《名僧傳》云：沙門僧顯，宋元徽中過江住京師彌陀寺。後入吳，憩華山精舍。華山上有方池，池中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¹⁷這是《名僧傳》僧顯傳記的佚文。現存《名僧傳抄》僅有「彌陀寺僧顯事」條，未見有僧顯的傳記文字。〈遊慧山寺記〉所引此條佚文，文字不多，卻也彌足珍貴。

最後，需要附帶指出的是，本文所論的《名僧傳抄》文本問題僅是一種比較典型的例子，但遺憾的是，《續藏經》中類似這種文本誤植、脫落、文字混淆等現象，《名僧傳抄》並非孤例。就我所知，《續藏經》卷八十八所收〈唐故白馬寺主翻譯惠沼神塔碑〉同樣存在嚴重的脫文問題。¹⁸此外，《續藏經》卷十七收有一部歸名為「大敬愛寺沙門智嚴」的《註楞伽經》，本註疏原有七卷，《續藏經》僅收卷一、卷二和卷五。問題在於，僅卷五有明確署名作者，其餘兩卷均未署作者名字。可是，我在京都博物館藏看到一卷明確題為智嚴所撰的《註楞伽經》卷一寫本，將它與《續藏經》本進行比較，發現《續藏經》所收的該疏卷一絕不可能是智嚴作品，因為兩者內容完全不一樣。續藏經本《註楞伽經》卷一到底是誰的著作，目前還不清楚，甚至我懷疑其卷二也可能不是智嚴的著作。總之，上述這些例子，至少提醒了我們在今後學術研究過程中，

■

T34, no. 1720, p. 363c8-12。此外，唐代元康《肇論疏》卷一有一句「所以童壽歎言下，此語出《名僧傳·慧觀傳》中」，見《肇論疏》卷1，CBETA, T45, no. 1859, p. 164c27-28，慧達曾為《肇論》寫序，序中有「童壽歎言：解空第一，肇公其人」，由於可知，「解空第一，肇公其人」這四字，曾出現在《名僧傳·慧觀傳》中。

¹⁷ 清·董誥等纂修，《全唐文》卷433，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538。

¹⁸ 詳情請參見拙稿，〈續藏經本〈唐故白馬寺主翻譯惠沼神塔碑〉脫文補正〉，《古典文獻研究》22：2，2019年，頁177-188。

斷不可輕信或過於依賴《續藏經》提供的文本，除了需要注意一些錄文誤植之外，還要警惕其中的脫文、誤收等現象。

中國佛教大藏經的發展前後經歷了寫本、刻本、鉛字印刷本，以及當前數字化文本等四個階段，其中鉛字印刷本藏經的編輯和出版，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意義，因為它的底本均來自之前的寫本或者刻本，而又作為之後 CBETA 等電子數字化藏經底本的主要來源。《續藏經》作為一部已經被電子數字化的鉛字本藏經，流傳甚廣，影響深遠。正因為如此，考察《續藏經》所收的每一種文獻的底本來源及其文本質量，就成為佛教學術研究所不能忽視的問題。我們相信，隨著今後《續藏經》所據的工作底本——京都大學「藏經書院文庫」收藏本的逐步公開，《續藏經》的底本問題必將會引起學界的重視和進一步研究。



附記：

本文是 2019 年 8 月臺灣佛光大學與佛光山共同舉辦的「佛教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參會論文，並在大會上作了口頭發表。會上得到佛光大學教授萬金川先生、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吳疆教授的指點。會後，全文在我自己「積薪齋」的微信公眾號上推出，引起中國大陸的一些學者和美國斯坦福大學李尚曄博士的關注。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方圓博士閱讀我的推文後，指出我在道安傳中的若干錄文和標點的問題，因而得以改正我的失誤。在此一併表示我的謝意！



引用書目

佛教典籍與古籍

- 《法華玄論》，CBETA, T34, no. 1720。
《法華義疏》，CBETA, T34, no. 1721。
《肇論疏》，CBETA, T45, no. 1859。
《高僧傳》，CBETA, T50, no. 2059。
《續高僧傳》，CBETA, T50, no. 2060。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名僧傳抄》，CBETA, X77, no. 1523。
《全唐文》，清・董誥等纂修，北京：中華書局，2001。

現代專書、論文

- 方廣錫，2010，《方廣錫敦煌遺書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平岡定海，1960，《東大寺宗性上人之研究並史料》，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上、下冊。
春日禮智，1936，〈淨土教史料としての名僧傳指示抄名僧傳要文抄竝に彌勒如來感應抄第四所引の名僧傳に就いて〉，《宗學研究》12，頁 53-118。
湯用彤，2010，《魏晉玄學論稿及其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楊之峰，2009，〈《卍續藏經》的編纂及其文獻價值〉，《圖書館理論與實踐》3，頁 53-55。
釋定源，2015，〈續藏經本《名僧傳抄》錄文疏舉正〉，《古典文獻研究》18，頁 241-332。
釋定源，2019，〈續藏經本〈唐故白馬寺主翻譯惠沼神塔碑〉脫文補正〉，《古典文獻研究》22：2，頁 177-188。

網路資源

京都大學「藏經書院文庫」網頁介紹：

<https://www.kulib.kyoto-u.ac.jp/bulletin/1387868?scene=2&clicktime=1607741965&enterid=1607741965&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2020/12/10。